

再談文化旅遊



善治若水 胡恩威

台灣地區放寬防疫限制，恢復港澳人士到台灣自由行。近十年，台灣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，自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》訂立之後，衍生了文創產業園。得益於台灣科技產業的大力支持，文創產業迅速發展。台灣的政策是以培養人才為本，發展出具有特色的文創產業。

文化是台灣旅遊的一個重點。除了台北故宮博物院和台灣博物館之外，台北市還有各式各樣的藝術空間和展覽空間。其中一個較為突出的是台北市立美術館。它的空間大，可舉行不同形式的藝術展覽。比如，近期舉行的展覽「狂八〇：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」，以作品、檔案、音像記錄及訪談，追溯台灣八十年代藝文發展史的脈絡和文化轉變，展覽也提到香港文化當年如何影響台灣文化發展的情況。

除了台北市立美術館，台灣歷史博物館、台北當代藝術館也有很多精彩的展覽。到台灣看展覽，基本上看一個星期也看不完。除了展覽空間，表演藝術發展也很蓬勃，各種形式、規模的表演藝術場地都有。文化創意產業園裏擁有一些Live House（小型音樂表演場地），為表演者提供與觀眾更多互動的機會。

畢竟血濃於水，中華文化一直以來都是台灣文化的主軸。例

如桃園市有一間橫山書法藝術館，展示台灣書法藝術成就，重視書法、水墨的傳承，這些都是台灣重要的文化旅遊資源。文化旅遊要有深度，要多元化，不是水過鴨背或走馬看花，才能夠令旅客有興趣再次重遊故地。

在筆者看來，這些都是香港發展文化旅遊值得參考的經驗。文化和旅遊息息相關，可能有人覺得旅遊會把文化水準拖下去，但其實關鍵是如何去做。相信到過東京、台北旅遊的人能感受到，這兩座城市的文化氛圍濃郁。台灣文化軟實力一直以來都很強，誠品書店成為台灣的一個文化品牌是其一，再如八十年代滾石唱片，賴聲川的表演工作坊、林懷民的雲門舞集等等，皆在內地乃至全球華人社會中具有深遠的影響力。

文化旅遊是一個深層次的議題，需要深度認識和分析，並非只著重「數人頭」，而是需要質量兼備，數要有「質」也要有「量」。台灣制訂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》之後，大量文創產業園和文創空間興起。藝術家和創意工作者有空間發展，才能夠創作出好作品。培養大眾對文化藝術的認識，為藝術市場打好基礎。這正是文化政策的重要性，換言之，政策要創造一個平台，讓大眾可接觸到不同類型的藝術，從而讓整個社會更多元化、更具深度和思想性，也更富創意。這樣的社會，自然會有吸引力，吸引更多旅客到訪。

落馬洲緝毒犬



市井萬象

在筆者小時候，店舖養的貓狗實用性都很強，比如養狗為了防賊，養貓防鼠。可今天的貓狗寵物化了，已經不一定需要那些能力，像筆者養過的一隻貓就對蟑螂視若無睹，懶洋洋的一動也不動。

說到「實用」，海關的緝毒犬一定數一數二，七歲的緝毒犬Diesel靈敏機警，駐守落馬洲海關，牠的工作包括執行緝毒、搜查爆炸品、大量現金、槍械及煙草等，以防範恐怖活動，保護市民生命和維護國家安全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古都中的新日本



流動空間 方元

去京都旅行時，我特意帶上川端康成的小說《古都》。如果單看書中九個章節的標題，你會以為這是一本旅遊書，而不是一本小說。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所說：在《古都》中「城市本身才是真正的主角。」以前去京都時，我是用建築師的眼睛去看城市。這一次，我借來日本文學家的眼鏡，試從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看京都。

建築是人類創造的空間。川端也說：「要是沒有人類，也就不會有京都這座城市。」所以，有什麼樣的人，才會有什麼樣的建築空間。《古都》講的是京都少女千重子受到身世困擾和遇到學生妹妹的故事。一些文學評論說，川端的小說表現了孤獨美、古都美和傳統文化之美。但我看到的《古都》是一個關於丟失身份、雙重身份，以及尋找身份的故事。有趣的是，困擾千重子的問題也是我在研究中國現代建築時常會遇到的問題。

雖然小說名為《古都》，但故事發生在現代的日本。川端的小說寫於六十年代初，此時日本的經濟發展已超過二戰前的水平。帶領日本戰後經濟復興的是明治時代出生的那一代人。然而，戰後的這次全盤西化與十九世紀「明治維新」的情況是不同的，主導者不再是日本的天皇，而是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。因此，這一輪的全盤西化實際上是「全盤美（國）化」，對傳統文化的衝擊遠遠大於日本過去所有的西化運動。川端的小說即是對這個時代的回應。它折射出日本人在這個大轉變時代的複雜心境。

當傳統文化的老屋面對着全盤西化的推土機，而日本在經濟復興後亟須重建文化身份的時候，川端讓人們重新發現了日本傳統文化的價值。他的小說既有對老日本的懷念，也是對新日本的呼喚。正如諾貝爾獎評委指出的：川端「在戰後兇猛的美國化浪濤中，溫柔地提醒我們：為了新日本，有必要保存老日本的某些美和民族個性。」

當文學家為了保存和發揚傳統文化而奮力筆耕的時候，日本的建築師在做什麼？或者說，京都有沒有有一座現代建築可以與川端對話？

川端說：「在京都，論山就得說叡山。」正是在叡山山麓，我找到了一座可以與《古都》對話的建築——京都國際會館。它建於一九六六年，由日本建築師大谷幸夫設計。它的傾斜外牆讓我想到王澍

設計的寧波博物館（二〇〇八年）。假如普立茲克建築獎在六十年代已成立，那麼大谷可能會在獲獎名單上。假如京都國際會館建於二〇〇八年，那麼大谷將是王澍的一個有力的競爭者。

京都國際會館雖然是現代的鋼筋混凝土結構，卻表現出日本傳統建築的神態。梯形正反組合的造型令人聯想到日本的神社和古民居。同時，長長的、帶有一排六角窗的側壁像是科幻影片中的太空飛船的船舷，帶有未來主義的意象。粗獷的、岩石般的牆體與自然環境渾然天成，錯落起伏的建築輪廓與叡山遙相呼應。按大谷的話講，這是建築與自然環境在「對話」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這是一座西式的、功能主義的現代建築，但同時讓人一眼就可辨認出它的日本文化身份。大谷並沒有抄用大屋頂、瓦片牆之類的傳統符號，而是在現代建築的設計原則下，巧妙地將現代空間結構中注入了日本文化的精神，從而把現代與傳統、未來與歷史、自然與建築，合成一個共生的有機體。如果將京都國際會館與寧波博物館進行比較，我們可以看出，雖然兩者在形式上有相似之處，但在思想和設計手法上是很不同的。

大谷的建築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作品，探索日本現代建築新方向的不是僅有大谷一個人，而是有一個叫作「代謝主義」的群體。它的帶頭人即是他的老師丹下健三。這個群體還包括了磯崎新、槇文彥、菊竹清訓、黑川紀章等一批中青年建築師。他們認為，建築和城市應通過新陳代謝，成為不斷生長的有機體。

在建築藝術上，他們對西方現代主義建築進行了反思和批判。為了表現日本文化的獨特性，他們提倡給現代建築注入日本的空間元素。為此，他們回到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。他們的作品為現代日本樹立了新形象，提高了日本建築在國際上的可

見度和認受性。然而，由於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機，這艘駛向未來的代謝主義飛船停在了七十年代。

川端的小說與大谷的建築幾乎是同時出現的：一九六二年川端的《古都》出版，一九六三年大谷的設計方案中選，一九六六年京都國際會館建成，一九六八年川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除了在創作時間上同步，他們在藝術理念上也有共鳴。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典禮上，評委會的代表、詩人奧斯特苓(Anders Österling)在致辭中說：川端「誠然受到現代西方的寫實主義的影響，但同時，他更忠實地保留了日本古典文學的根基，並明顯地表現出一種珍惜和維護民族傳統風格的傾向。」如果用這段話來評述大谷和他的建築，那也適合。

川端和大谷的一個共同點是：雖然在作品中都有傳統的元素，但他們的目的不是回到過去，不是恢復傳統，而是經過消化和吸收傳統，採用現代的手法，創造出新的、具有日本特色的現代文化。

不同的是，大谷的建築是開朗的、剛陽的、充滿了自信和樂觀，而沒有川端小說中那種含蓄的、陰柔的、瀰漫着自憐的傷感。川端與大谷的年齡相差二十五歲，屬於兩代人。川端發表《古都》時是六十三歲，大谷設計國際會館時是三十九歲，他們處於不同的人生階段。因此，他們在看待日本的過去和未來時會有不同的角度，並創作出不同的藝術形象。但殊途同歸，他們都找到了那個融合了現代與傳統文化的「新日本」。

川端的小說使我對日本建築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在《古都》中有許多對京都建築的描寫。不過，在川端寫成小說的時候，京都國際會館的設計方案尚未揭曉。倘若他在看到大谷的「新日本」建築之後才寫《古都》，那麼他的筆調會不會少一點傷感？小說的結尾會不會是一個有陽光的溫暖的日子？



飛船。京都國際會館的外形像是科幻片中的太空作者攝

賞花應及時



HK人與事 文秉懿

踏入春季，香港不少地方鮮花綻放，引來媒體報道，圖文並茂，甚至附上交通資料，方便市民前往。

我對於櫻花情有鍾，參考多篇文章後，選出赤鱗角的櫻花園為目的地。我約了一位少女同遊，由屯門乘坐機場巴士出發，只消十分鐘就到達。下車後沿着指示，步行幾分鐘，就進入櫻花園。沿途見有人在海濱擺姿勢拍照，已經猜想到遊人甚多。本來我以為在星期四大清早前往，可以避開人潮，靜心賞花，料想不到懷有同樣心思的人為數不少。在沸騰人氣中賞花，多人同樂，亦有其佳妙之處。

跟隨其他人往前走，放眼一看，我被枝桠寂寞的景況驚呆。身處草坪外圍、最接近遊人的樹木，枝上光禿禿。向有人停留的樹走去，果然，樹上有櫻花倖存，花開得也算茂盛，顏色淡雅，粉嫩粉嫩的，青春可喜。花朵彼此挨近，小女兒湊在一起談心事似的。談到有趣的話題，笑得抖顫起來，那就是花枝在風中輕晃。有花的樹在禿樹之間顯得特別珍貴，吸引人們抓住這少許

景色，積極拍照。我和少女也掏出手機拍照，除了拍攝自己，還特意拍下仍然盛開的櫻花。等候的人多，我們隨便拍了幾張，趕緊走開，把位置讓出。遊人似乎有默契，都謹守秩序，拍照後立即離開，不願阻礙別人。

有一些樹製造假象，幾尺之外，分明看到滿枝粉紅，可是走近一看，原來花朵已經枯萎。遲暮美人，看它們的狀態，大概快要落到地上，化作春泥。我和少女繼續尋找開花的樹，還可以找到幾棵。根據介紹，這兒種植了八十多棵櫻花樹，可惜我們見到開着花的不足十分之一。我當然有點失望，只好自我安慰，總算看到盛放的櫻花，慰情良勝無。再說，物以罕為貴，漫山遍野的櫻花海固然動人，遊人浸泡在花海中，一身花影，滿口讚嘆。不過，尋尋覓覓才得以見面的櫻花，更加突出。得來不易跟手到拿來的情况比較，又是一番境界。

我們逗留不足十五分鐘就離開，少女看來有些許失落。其實二月初我已經讀到有關櫻花開放的文章，櫻花花期短暫，我應該立即行動，才可以享受到櫻花盛放的美景。行樂須及春，賞花應及時，立下心意就出發。吸取教訓，明年一定成功捕捉到滿園櫻花的盛況。

可人最是香江色



東言西就 沈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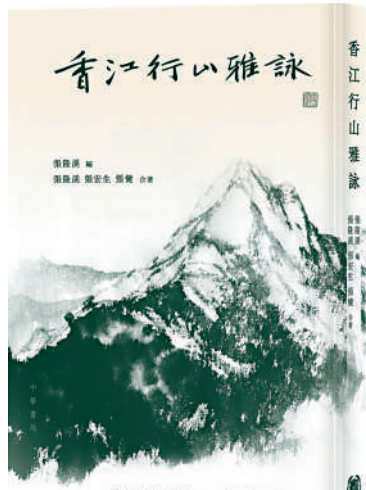
在剛剛過去的情人節，參加某新書發布會，恍若赴了一場非一般約會，無關飲食男女，卻是風月無邊。事緣那是香江山水與古典詩詞跨越時空的浪漫邂逅，那是學者行山與文人雅詠讀書行路的完美結合，妙不可言。

一切皆因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《香江行山雅詠》而起。可以說，這是一場心靈與好書的約會。疫中三年，不免寄情於山水之間。壯闊的海、連綿的山、蒼鬱的林、繽紛的花……一直相連在路上，也時常相逢在夢中。遺憾的是，筆者未嘗有直抒胸臆的文學修為與吟詠雅興，平白辜負了自然山水的饋贈。直至遇見《香江行山雅詠》，方才發覺原來早有張隆溪、張宏生與張健等知名教授，以中國古典詩詞記錄香港風貌，建構香港地景文學，在山行山雅詠之間建立鏈接，抒發出行山客入人眼中皆有卻又個個口中皆無的感悟和體驗，令人額手稱慶、拍案叫絕。

追溯《香江行山雅詠》的緣起，原來已是二十年前。當年香港深受沙士疫情影響，時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教授相約同事及家人結伴登山遊玩，自此形成周日行山慣例。行山規模日漸壯大，不乏訪問學者加盟，在多元文化氛圍中，共度了許多休閒調適與思想交流的好時光。十餘年間，行山團

活動亦更形豐富，以張隆溪教授和張宏生教授為主力，從行山中途休息時間的古詩詞解說與朗誦，到行山過後回味時段的古詩詞創作與唱和，古典詩詞日益融入現代行山之中，藉傳統形式表達當代生活，抒發現實感受，諸山友在強身健體之餘，得以「奇文共欣賞」，感受傳統文化之美。

正如張信剛所言：《香江行山雅詠》的特色即在於其創作的時代、地點與環境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，一個多種文化並存的國際大都會，兩位文學教授每周與各方學者登山同遊，交流思想，共話情懷，其寫就的詩詞作品，自然反映出如此獨特的人、地、時。活動現場，與其說是新書發布會，毋寧說是新書分享會。從行山組織最初發起人張信剛的談諧薦書，到行山路線早期策劃者鄭培凱的談笑說書，從作者張隆溪、張宏生與張健諸教授的編著心得，到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王強的閱讀感言……在著名古琴家梁基永《關山月》與《洞庭秋思》的悠揚琴聲中，



《香江行山雅詠》。